

• 马克思主义哲学 •

重置资本逻辑的尝试*

——评《21世纪资本论》

邹 诗 鹏

【摘 要】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颠覆了传统的资本概念，提出资本主义发展的实质是资本收益率（ r ）>经济增长率（ g ），此判断揭示了当今金融资本主义的基本事实，显示了政治经济学传统的某种回复趋向，但著作显然不可同《资本论》同日而语。著作将技术摒弃于资本收益率之外，实是无视技术的资本化。著作提出的征收全球累进税与实现社会国家方案有较强的针对性，但不切实际且学理粗疏。著作对当下中国制度建设及其反腐行动做了有一定启发价值的分析，但其 $r > g$ 的判断无法解释中国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及其持续的市场活力。

【关键词】资本 资本收益率 经济增长率 全球累进税 社会国家 [中图分类号] B03

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未出中文版时，即已引起域内高度关注。这部包含皮凯蒂及其团队研究成果的集成性著作，显示出对当代资本问题的洞察与思考，且提出了相关方案。著作问题意识强烈、历史资料丰富、视域开阔、富于洞见、引人思考，为较为全面地研究当今全球时代的资本问题，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文本。作者明确宣称自己并不欣赏自以为是的“经济科学”，而“更喜欢政治经济学”，因为这一学科“传递了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唯一区别：其政治、规范和道德目的”。（皮凯蒂，第592页）著作在较为自觉的制度分析与社会政策框架中展开，并实现了经济研究与道德批判的有机结合，皮凯蒂本人即将其研究范式称为“政治和历史经济学”。（同上，第591页）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已习惯性地撇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但却无力就诸多综合性的经济政治问题展开研究的情况下，此著提示了一种重新开放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巨大空间。关于著作的显赫书名，作者表达了某种自谦，但就其理论取向及其问题意识而言，此著实是在尝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展开对话。其中，著作引人注目地提出了作为资本主义基本规律的“ r （资本收益率）> g （经济增长率）”。此著试图颠覆马克思基于生产逻辑的资本概念，而将资本金融化，并置于社会政治权力关系之中， $r > g$ 取代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不过，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此说不过是对19世纪以来的消费交换理论及其边际效应理论的持续巩固，只是经过作者的改造与扩容， $r > g$ 更加适合于分析当代金融资本主义及其复杂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矛盾。但是，撇开劳动、技术而如此重置的资本逻辑是否能够取代古典的资本逻辑，显然是问题。为应对 $r > g$ 的矛盾，皮凯蒂提出

* 本文受上海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支持。

了实施全球累进税及建立社会国家的设想，但也必然要面临社会实践、学术理论史、社会思想史以及理论内容方面的精细论证。此著对当下中国问题有较大的启发价值，但仍然还是外部性质的观察。

一、“资本”的新定义与 $r > g$

皮凯蒂对资本的规定独树一帜。“本书中提到的‘资本’均不包括经济学家们经常提及的（在我的印象中）‘人力资本’。人力资本通常包括个人的劳动力、技术、熟练程度和能力。在本书中，资本指的是能够划分所有权、可在市场中交换的非人力资产的总和，不仅包括所有形式的不动产（含居民住宅），还包括公司和政府机构所使用的金融资本和专业资本（厂房、基础设施、机器、专利等）。”（皮凯蒂，第46页）明眼人可以看出，正如其将国民收入分为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资本也是有意同劳动区分开来。这同马克思对资本的定义完全不同。在皮凯蒂那里，凡是称为资本的，往往指涉了马克思所说的不变资本，而被皮凯蒂所排斥的人力资本（劳动力），正是马克思所谓剩余价值的前提。将人力资本公然排除于资本之外，而将非人力资本反过来直接看成是资本，显然颠覆了马克思的资本概念，也颠覆了古典经济学的生产理论及其劳动价值论。

在资本发展的今天，对资本的确有必要进行新的规定。皮凯蒂显然在这方面做出了尝试，但其对资本的重新规定缺乏学理上的论证。颠覆马克思资本概念的目的，不外乎是将流动且自洽的金融资本体系独立出来，形成金融资本与实体性资本的对比关系，进而直接给出 $r > g$ 这一命题。皮凯蒂显然没有论证，但这一命题本身却被他看成是资本主义的核心命题，所谓“所有结论的整体逻辑”“分化的根本力量”以及“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同上，第27、26、589页）明眼人可以看出，皮凯蒂实是以 $r > g$ 取代了马克思所定义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皮凯蒂看来， $r > g$ 的情形“在19世纪前一直存在”，并“在21世纪再次出现”（同上，第27页）作为资本主义的典型现象，尤其表现在资本储蓄远高于经济增长并导致社会的非均衡化。“继承财产的人只需要储蓄他们资本收入的一部分，就可以看到资本增长比整体经济增长更快。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那些劳动一生积累的财富，继承财富在财富总量中将不可避免地占绝对主导地位。”（同上，第27-28页）皮凯蒂借用李嘉图的理论说明，何以稀缺性的资本（如房地产与矿山）及其高价产品“进一步加剧结构性的分化”。（同上，第28页）按照皮凯蒂的分析，“ $r > g$ 的根本性不平等，它与任何形式的市场缺陷都无关。而恰恰相反，资本市场越完善（以经济学家的角度）， $r > g$ 的可能性就越大”。（同上）皮凯蒂暗示， $r > g$ 并不是市场化造成的，但市场化却推进了 $r > g$ 。

皮凯蒂指出应通过公共制度及其改革抑制 $r > g$ 的持续扩大，建立全球范围的民主，实现“高水平的国际协作和区域政治一体化”，实施全球累进税政策。皮凯蒂也坦陈，在国际体系仍受民族国家强力支配的格局下，所谓全球累进税政策依然是“乌托邦”。（同上，第531页）今日国际政治的基本格局，仍然是胶着且存在着多重矛盾关系的民族国家格局，解决如此格局的矛盾，民主当然是一个基本理念，但不能以为马上就可以建构相应的国际政治制度。其想法是诱人的，但却反映了一种很不成熟的国际政治观。 $r > g$ 的思想，不仅颠覆了政治经济学传统的生产与资本逻辑，也否定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按照皮凯蒂的分析，只有在资本收益率为零的情况下，劳动的作用才被直接放大，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建立在资本收益率不断增长的前提下的，因而与劳动并无因果关系。皮凯蒂否定了由亚当·斯密敞开并在马克思那里被发扬的劳动价值论。“对18、19世纪而言，估算资本存量价值可能比估算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流量更为准确。今天，这个结论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如此。这就是我为什么像多数经济学研究人员以往所做的一样，强调资本/收入比的演变，而不着墨于资本—劳动划分。”（同上，第208页）皮凯蒂的关注点是劳动的智能化以及非物质劳动，而不是工人的处境，

由此也就舍弃了劳动的政治分析，进而也不太可能在其所属意的社会政治论域做出更为深入的分析。

皮凯蒂将马克思的资本学说称之为“无限积累原则”，这需要分辨。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用了足足五章阐释资本积累理论。在马克思那里，资本积累乃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前提，但资本积累自身的“无限”其实是“有限”的，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限度，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及其资本积累的膨胀，本身就会导致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终结。“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74页）在马克思那里，资本积累过程的分析，显然从属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批判，因此不能将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径称为“无限积累原则”。实际上，皮凯蒂借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设定了一个关系式：资本积累越多，资本收益率越是下降，不过这毋宁说是方便批评而对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的某种简化。皮凯蒂自己并不相信资本积累乃资本主义发展的恒定支撑。从理论资源上看，对资本积累的迷信，不是来自于由韦伯特别阐发的清教伦理，就是来自于由马克思特别强化的生产逻辑，但皮凯蒂显然更加集中于对马克思的批评。在这一过程中，在不断抱怨马克思没有系统地对待手头的统计资料时，皮凯蒂特别愿意显示他及其团队在掌握数据方面的优越感，不过，此著诺贝尔奖提名被否定，其原因就是“统计数据存在逻辑缺陷”，这本身就说明了一些问题。

本质地说来，马克思的资本分析是质的分析，他非常清楚，应让可能的数据分析统一于社会与历史性质的分析，正如有关资本的实证研究应统一于资本的历史批判。马克思显然看到了 $r > g$ 这一事实。资本化“从形式规定性方面看，是价值自行增殖过程。价值自行增殖过程既包括预先存在的价值的保存，也包括这一价值的增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70-271页）在此，“价值自行增殖”乃是 $r > g$ 的不证自明的前提，皮凯蒂不过是将马克思所要批判的商品经济的常识看成了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律。但马克思显然不满足于如此前提，在马克思那里，“没有任何生产过程或流通过程作为媒介”，即“没有内容的形式”的“生息资本”（马克思，第441页），正是其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商品拜物教批判的前提，马克思正是藉此揭穿了“资本的没有概念的形式”以及“生产关系的最高度的颠倒和物化”。（同上，第442页）现在，皮凯蒂将马克思那里“独立于再生产之外而具有增殖本身价值的力量”看成是资本本身天然具有的增长能力，把马克思那里“抽象”的“生息资本”还原和具体化为资本主义过程，但他并没有实质性地理解马克思所说的“抽象”：资本利润从其形式化的资本化过程的抽离，乃是对劳动及其社会生产关系的赤裸裸的剥削，“抽象”乃是对资本主义投机本质的揭示。

$r > g$ 的理论实质，说到底还是对马克思所批判过的消费逻辑的再现。古典经济学有关消费的思想引起了马克思的批判，在马克思之后又显化为消费与交换理论（韦伯、西美尔、凡勃伦等），亦在边际效应理论中获得积极回应，而其最为直接的社会现实基础，即金融资本主义。在消费拉动生产的资本主义时代，最为明显的经济事实必然是金融性资本控制经济增长，因而必然呈现 $r > g$ 的情形。 $r > g$ 不过道出了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基本逻辑。显然，若要使得相应的金融危机可控，就必须考虑生产逻辑及其劳动对于消费逻辑的决定与支配关系。当皮凯蒂通过金融化资本否定劳动及其人力资本时，其对于当今地球上仍然存在的不公正，实是置之不顾的。

二、拒斥技术进步？

在现代思想中，《资本论》受到的最大质疑，就是技术进步导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有效地避开了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所敞开的劳动异化及其道德问题。皮凯蒂延续了这一质疑。在他看来，因为过度

依赖于资本—劳动分析，导致马克思忽视了技术（参见皮凯蒂，第216页），并相信资本的无限积累。“资本家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资本，最终必然导致利润率（即资本收益率）下降和自身的灭亡”。（皮凯蒂，第231页）在皮凯蒂那里，构成资本收益率的两种力量（即技术与资本存量的充足度）之间构成了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仿佛强调资本存量的充足度实现资本收益率，就一定会排斥技术。不过，皮凯蒂指责马克思忽视技术，但其资本收益理论同样忽视了技术；在他那里，技术从属于“人力资本”，但人力资本本身并不带来资本收益率。

皮凯蒂也肯定技术进步。“技术的进步理应导致人力资本较之于金融资本和房地产的胜利、有能力的管理者对股东大亨的胜利、技术实力对裙带关系的胜利。”（同上，第22-23页）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推动更进一步平等的主要力量仍是知识和技能的扩散。”（同上，第23页）但是，“理应”并不意味着“实然”，“仍是”也不等于“必然是”。来自于社会政治的制衡力量成了决定性因素。“经济和技术的进步不一定意味着民主和精英管理的进步。主要原因非常简单：像市场一样，技术既没有极限，也没有道德。技术的进步当然提高了对人的技能和能力的要求，但也提高了对公共建筑、民宅、写字楼、各种设备、专利等的要求，所以最终所有这些非人力资本（房地产、商业资本、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的总价值几乎与劳动总收入一样迅速增加。如果真想在公共效用基础上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社会秩序，光指望不可预测的技术是不够的。”（同上，第237-238页）而持续扩大的制度上的不平等，愈加巩固了社会的技术化及其收入的不平等，“不平等这一惊人增长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高阶劳动收入的空前激增，大公司高级管理者在收入上将其他人远远甩在了身后。”（同上，第26页）皮凯蒂敏锐地看到，高管们过高的收入显然不都是来自于其智识及管理才干，而是主要来自于不公正的分配制度。这里涉及到了市场机制中高知型企业管理者的特权，此特权看上去超出了传统政府形态的特权，但既然技术并不必然等于资本的收益，而是要求关联于公共财富的分配，那就不存在高管拥有制定自己薪酬的特权，而是必须要从属于累进税制度，并受到公权的约束。

与马克思充分肯定技术进步的积极意义相比，皮凯蒂不那么重视在今日经验世界已经习以为常的技术进步。与其说他是关注技术，倒不如说是建立了一套避开技术介入的专门的金融资本分析框架。但是，这样一来，如下几个问题不是成为误区，便成为盲区。其一，由技术进步所支撑的经济增长，无论如何是资本收益率增长的前提。正如只有在经济增长的前提下才能讨论增加收入一样，对技术进步的肯定，实际上要求在资本收益率及其收入增长方面得到建构性的理解；何况技术进步经常也要求社会政治结构的不断改革，技术进步背后还是知识的不断创新与进化。其二，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之分，是传统一直到国民经济学得以衡量收入乃至权力关系的基础，马克思则将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定位为人与世界的关系，并将劳动解放本质地看成人的解放。据此判断，当皮凯蒂有意忽视人力资本因而忽视劳动时，人与世界的互动关系、进而人的世界的流动性，实际上都被有意无意地舍弃了，仿佛人们只是被动地从属于某一新的制度规范。高管收入的评价确实超出了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之分，但如果完全舍弃这一区分，只是满足于制度规范及其政治方式，同样不能较为周全地实现高管收入的分配制度改革。皮凯蒂显然没有跳出理性经济人假设。此著不仅与《资本论》不可同日而语，恐怕同当代西方许多杰出的经济学理论著作相比，也存在不小的差距。其三，排斥技术的资本批判，实际上无法避免技术世界的资本化，更无法避免人的世界的技术化。如果说马克思资本批判中还包含或可以开出技术批判的维度，那么，此著在技术批判上则是一个空缺。比如，技术殖民这一重要现状，就不在其分析框架中，甚至于被有意遗漏了。然而，今日世界中的资本收益与收入问题，制度上的分析十分必要，技术上的批判也绝不可少。简言之，技术本身绝非只是物化，而是意识形态。

皮凯蒂的研究，接续了整个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对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的一个强有力的批判，正

是被马克思纳入不变资本的技术，实际上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财富增长的主要动因。因而，利润越来越多地来自于技术进步。相对于依赖机器及其技术提高实现利润增长，通过高强度的剩余劳动时间的榨取不仅相对有限，还要承担巨大的道义代价，而且随着工作日制度的实施已完全不可能。然而，这些批判没有超出马克思的构想。在马克思那里，在一般资本范畴下讨论的剩余价值学说，标志着资本主义的经典结构，或套用韦伯所谓“理想型”的说法，是奠定了一种经典资本主义分析的理想型。马克思如此这般的分析，其实是要建立一个典型的制度批判框架，即无论在哪些发展模式下，由剥夺剩余价值所巩固的资本主义制度，一定是不合理的并且是反人性的，因而必然受到经济的和道德的双重批判，而如此批判乃制度变革的基础。马克思展开了资本主义的制度批判，而诸多现代社会政策则不同程度地吸收了马克思的批判。

因此，对问题的清晰分析还须回到马克思的理论框架。马克思十分肯定工业革命及其技术发展对资本主义的巨大推动作用，马克思不是技术决定论者，因为马克思是将工业及技术纳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批判性分析中，其对技术的理解是置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前提下的。马克思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皮凯蒂巩固了时下经济学家的一个流行观点，即高收入的企业高管与企业的私有制及其财产关系无关。但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看，如此的思考恰恰没有进入且有意绕开了高收入的制度基础及其社会权力关系。不仅高管，就是工厂监工的活动属性，也都是从属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股份制无疑巩固了如此关系，至于非物质劳动同样会与私人占有制关联起来。看起来，高管们凭借知识获得高收入，但实际上还是凭借不公正的分配制度。因而，要合理实现知识（公共品）的社会经济效应，就必须建立合理的分配制度，在必要的状况下，还需要改变既有的不公正的社会生产关系及其社会权力关系。因此，问题的关键不是纠结于知识经济的性质，而是不断促进分配制度的改革与完善。知识经济必然关联于一定的社会政治效应，并不是制度分配体系的“例外状态”。

三、“社会国家”：现实方案还是乌托邦？

此著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社会国家”，也是其有关制度建设的落脚点。著述本身并没有对社会国家概念展开思想史的讨论，更没有展开政治哲学、法哲学、伦理学以及社会理论等当代理论资源方面的讨论与论证。不过，作者提出这一概念的针对性是很强的。我们不妨不纠缠于学术层面，而是直面其问题意识。著作不断重复这样一种看法：摆脱 $r > g$ 及其不公正，根本的途径即实现金融透明性与全球累进税制，具体取决于社会国家的建设。“构建现代财政和社会国家是现代化和经济发展进程的核心组成部分。”（皮凯蒂，第 506 页）这里，现代财政（税）体系本身就是社会国家的题中应有之义。“20 世纪财政国家的演变基本上反映了社会国家的形成。”（同上，第 493 页）在皮凯蒂看来，当一个国家的税收收入超出“王权”用途，并自觉地担当社会职能时，即逐渐走向社会国家。而现代财税体系及其累进税制度的结果，必是社会国家。“社会国家”被规定为优于既定的“福利国家”“更好地把握了各国目标的性质和多样性”的国家形式。（同上，第 657 页，注 9）不过，从社会政策而言，其“社会国家”所要求的还是“福利国家”。“以 20 世纪发达国家所构建的‘社会国家’为代表的现代化财富再分配机制，基于一系列的基本社会权利：教育权、健康权以及退休权。无论这些财税和社会支付体系在今天面临多大的制约和挑战，这些制度与过去相比无疑是巨大的历史进步。”（同上，第 495 页）社会国家无疑是带给人们福祉与安全感的现代“欧洲社会模式”的表现。皮凯蒂声称对美国失望，而回到法国才找到学术感觉，主要源于其对法国社会国家传统的认同。让一个认同于新自由主义的美国接受“社会国家”的说法，看起来总比接受其所抵触的福利国家要高明一些，但恐怕美国新自由主义理论家们同样不会接受社会国家概念。

皮凯蒂十分强调社会国家的政治分析价值，“如果你拥有自由贸易与资本和人力的自由流动，但是却摧毁了社会国家和所有形式的累进税，那么，防御性民族主义和身体认同的诱惑将很可能渐渐变得比英国和美国以前都更加强烈。”（皮凯蒂，第555页）皮凯蒂提示了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同构性，其重心还是强调新保守主义的社会政策效应。反过来说，强化社会国家和所有形式的累进税，同样会影响资本及其人力的流动，降低社会活力，从而不仅制约经济增长，影响社会结构的团结，且同样激起防御性民族主义。实际上，正如经济增长越来越取决于社会政策及其资本结构的合理性，经济增长同样越来越成为资本增长的结果。一个稳定的现代经济与社会结构，实际上是资本收益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平衡互动的结果。在这一意义上，社会国家实有可能、甚至更严重地重蹈福利国家的惰性，在降低资本收益率的同时抑制经济增长率。但这是皮凯蒂尚未考虑的问题。

皮凯蒂显然希望其“社会国家”有助于解释落后国家及新兴国家的建设。在这方面，尽管其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主要是为欧洲式的社会国家辩护，但是，如此批判也指认了一个基本事实，即新自由主义抑制了贫困国家的社会国家建设。“1980年以后，源自发达国家的极端自由主义浪潮迫使贫困国家缩减公共部门开支并放缓了现代财税体系建设来推动经济发展的步伐。”（同上，第506页）“发达国家总是将发展中国家当成试验场，而根本没有充分汲取他们国家自身历史发展中的教训。”（同上）这里，皮凯蒂汲取了西方激进左翼的一些现成思想，冷战时期的非西方实际上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社会国家建设，而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或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则是疏于社会国家的建设。但如此解释忽视了许多后发展国家晚近以来展开的社会建设及其实践。皮凯蒂的社会国家，切中了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资本现实，引人思考，就当下国际政治及其人类发展处境而言，社会国家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概念，应该展开开放性的讨论。但皮凯蒂的社会国家，依然只是一个粗泛的乌托邦概念。

四、对中国发展的启发及其评价

$r > g$ 揭示了资本发展的矛盾，这对于仍以GDP增长为主要发展模式的当下中国，是有一定价值的。从现象上看，三十多年GDP的持续增长，也伴随着较高的资本收益率，表现在国家资本及其民间资金的巨额积累及其同样巨大的收益，尤其表现在房地产、稀缺资源以及部分金融衍生产品领域，与此同时则是贫富分化的持续加剧。但是，中国的问题更加复杂，皮凯蒂仍然只是一个外部的观察者。比如，基于当代中国的现实，必然建构一种总体而言是 $g > r$ （不是 $r > g$ ）的内生性的经济结构，以形成全面推进国家现代化的基础，这也是中国这一庞大经济体、发展体的本质要求。同样，他也不大可能理解，基于中国的制度空间及其巨大的流动性，以及强有力的国家治理能力，会在整体的资本收益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实现某种平衡，甚至于虽然出现了 $r < g$ ，仍保持了资本市场的活力。换言之，以经济增长推进资本收益，又以整体的资本收益刺激经济增长，在当下中国正在形成一个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新模式。

皮凯蒂认为经济制度应当保持相当的透明性，并要求反对特权，这当然重要。在这些年中国不规范的市场模式中，即存在着不透明的特权及其腐败，其复杂程度显然超出了皮凯蒂的思考。中国实际上必须考虑有关企业高管、尤其是上市公司高管高收入的论证与监管，但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似乎只是将其看成市场经济本身的问题，就是说，无论资本市场如何，高管高收入似乎都是理所当然。金融系统似乎被看成了社会系统的例外，但政府管理方面又没有免除对金融系统的不合理的干预，也存在内幕交易现象。在 $r < g$ 的背后，显然存在着资本市场的失范或不规范。

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近年来，在西方总是流传着这样的疑问：中国会买下整个世界吗？对于这一疑问，皮凯蒂看上去并不同意，认为这一担忧纯属“杞人忧天”。“发达国家的富裕程度实际上远远超过公众的想象。如今欧洲家庭拥有的房地产和金融资产在减去负债之后依然高达70万亿欧元。

而中国所有主权财富基金的资产再加上中国的外汇储备目前也就是 3 万亿欧元，不足欧洲家庭净资产总额的 1/20。因此发展中国家根本无力买下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必须要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才有可能做类似的举动。”（皮凯蒂，第 478 - 479 页）数据看上去很有说服力，可总觉得有什么地方很不对劲。当下中国拥有三十年前整个世界都无法想象的巨大资本吸纳能力，未来中国对世界的资本吸纳（包括购买世界的的能力）也很难以时日计算，这并不只是基于主权财富及外汇储备的购买力问题。何况，经济问题有其自身的非理性，一个现代文明国家理当恰当地控制其非理性行为，以实现国家财富的合理增长。就此而言，中国购买整个世界的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假问题。

问题与其说是取决于数据分析，倒不如说在更大的程度上取决于空间想象。正如皮凯蒂所提及的，2008 年金融危机之所以没有重演 1929 年毁灭性的“大萧条”，而只是较长时间的“大衰退”，与新兴国家的支撑分不开。“新兴国家的增速迅速反弹，支撑了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同上，第 487 页）其中，人力资本，这个不被皮凯蒂承认的“资本”，可谓功不可没。巨大的人口效应，显示出巨大的空间转移势能，这里存在着对资本的空间转移的全新理解，这就是从马克思式的、也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从属于资本的受动空间，转向由空间决定并创造资本的激进的和流动的空间。皮凯蒂注意到了金融资本的激进性与流动性，但看不到空间的激进性与流动性，而激进的空间观正是上一世纪 60 年代以来兴起的当代西方激进理论的主题（当然，即使当代西方激进空间理论，在理解今日全球化时代的空间转移问题上，也依然是迟缓的）。仅从资本的空间转移而言，新兴国家经济体对既有的西方经济体的对冲效应，实不能取决于既定的经济衡量与评估指标，何况发达国家的负债额也是很高的。金融总在朝向最具活力的领域或地区，中国实施的“一带一路”战略及其主导的反应超乎寻常的亚州投资银行建设，就很能说明问题。

问题当然还表现在另一方面，并且是十分重要的方面，这就是域外仅仅只是将中国发展看成是经济性质的扩张模式。中国购买整个世界的想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域外流行的中国威胁论的无反思的反映。因而问题本身并不只是经济问题，而是对中国道路的文明性质的把握。迄今为止，撇开右翼根深蒂固的偏见不论，西方激进左翼乃至中左及其知识左翼，多是将中国道路看成是新自由主义的从属模式，哈维甚至直接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哈维，第 137 页），中国崛起仿佛必然是资本主义的输出或扩张，因而“一带一路”及其亚投行建设，常常也作了如此解读。中国的这些举措当然有经济上的考量，包含着经济与资本增长的诉求，但同时必然要求肩负经济援助及其道义责任，因而更应该理解为和平主义及其天下责任的表现，也是大国责任的表现。因此，舍弃中国道路的文明性质，将有关举措简化为新自由主义乃至另一种新帝国主义，实是一种误判。当然，如此文明性质的讨论或许超出了经济学家的论域。但当我们回想起诸如马克思、韦伯等古典理论家总能把有关经济研究自觉上升到文明研究时，便会生出颇多感慨，真希望当下中国资本研究的同仁，也能尽可能在文明层面做一些思考。

参考文献

- 哈维，2010 年 《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 马克思，1975 年 《资本论》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9 年，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 年，人民出版社。
- 皮凯蒂，2014 年 《21 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黄慧珍

ABSTRACTS OF MAIN ESSAYS

Historical Thinking on Marxist Philosophy System in China

Yang Geng

Li Da's *Outline of Sociology* shall be marked as the symbol for the basic formation of the Marxist philosophy system in China. It also show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system in China started along the "bipartite structure" system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i Si-qí's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arks the establishment of dominating position of the system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China, while Gao Qing-hai's *Found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signifies that Chinese scholars have started the historical course of reconstructing the Marxist philosophy system. In general, Chinese scholars reconstruct the Marxist philosophy system in the direction of practical materialism.

On Power Transition

Han Qing-xiang Zhang Yan-tao

Violence, wealth and knowledge are three kinds of power in the process of human development, they coexist, work together, but have different proportion, influence and value. In general, the tendency of power transition is from "violence led" to "capital led" and then to "innovation ability led". This transition is both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wide us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inevitable developing trend of human society, and so is the internal requirement of human social history gradually moving towards the human itself. Reasonably grasp the tendency of power transition, building an innovative country, can enhance the social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bility, inspire everyone's creative potential, and determine the fate of China's future strategic issues, and so get a new opportunity to realize the Chinese dream. By the study of space-time background, the inner mechanism and the basic law of the power transition, we can grasp more clearly the world trend and the developing direction of Chinese transformation.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is an effective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analysis of world history, Chinese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China.

An Attempt to Reset the Capital Logic

Zou Shi-peng

Thomas Piketty's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s full with problem consciousness and insights, but is not a real deep work. It subverts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capital, and repudiated Karl Marx's theory of surplus value and analysis framework of confliction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 This work puts forward the core confliction of capitalism as the Return of capital(R) > the Rate of economic growth(G), it reveals the basic facts of financialization capitalist era, but takes the commodity economy criticized by Marx as the knowledge expression for the basic law of capitalism. He puts the technical slam out of the return of capital, and so is regardless of the technology of capital of the world. He raises the concept of social state, but it looks slack and impractical. His deficient mastery of China Road is still external observation and with limited value.